



李 騫 著

作家的艺术世界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家的艺术世界

李 骞 著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5 号

丛书主编:朵生春

责任编辑:盛宇康

封面设计:阿 千

当代诗人丛书

作家的艺术世界

李 骞 著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计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40千字 印数:1000册

书号:ISBN7-5616-2424-71/F·237

定价:6.40元

自序

从 1984 年我发表第一篇评论文章到现在,不觉已是十年。古人说:“十年磨一剑”,我虽然勉强磨出一把,剑锋却很笨钝。这十年时间我还发表了数百首诗,几十篇小说和散文。但却钟情于文学研究和评论,也许是我这个人喜欢对人对事都爱指手划足的缘故。这种秉性不好,我下过无数次决心要改,但终究没有革除,也就只好任其自然了。尽管这种毛病给我带来了不少苦头,但也只有如此。

我不是一个天才的评论家,更不是思想敏锐的文学研究者。我没有才气,也很难有什么独立的见解。我所做的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出一些认识来,充其量仅仅是个“写匠”罢了。我十分自信自己的那点蹩脚文字决不会流传千古,甚至可能没有一个读者,但还是照样一如既往的写下去,这并非什么崇高的追求,不过是有一点“写瘾”,几天不写东西手会发痒。诚如“麻将瘾”、“吸毒瘾”、“官瘾”一

样，不过是满足一点人性的欲望。要是勉强说是改造别人的灵魂，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硬要把自己打扮成一派大师嘴脸，那更是十足的不知山有多高、天有多大的井底之蛙。有些人发表了几篇作品甚至根本没有在正规刊物上发过那怕一首小诗，就自充文学大师，占山为王，唯我独尊，实在可笑。其实，千百年来的文学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大师是自己封出来的。再说，自有文学记载以来的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史上，又有几个堪称大师的人？不上高山，怎知平地之可贵，不读史书，那里知晓做“写匠”的悲凉？

有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写作？”这个很平常的问题一下子难住了我。这个“为什么”有几天搞得我心神不宁。为权吗？为钱吗？为职称吗？都不是。从古至今，文人做官，不管做多大，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屈原、陶渊明、李白、王安石，都不是为了做官而选择文学。若说是为钱，那就更不用说了，当今物欲横溢的年代，那几个称之为稿酬的小钱难为柴米之炊，但是已经比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好多了。曹先生撰千古杰作《红楼梦》时，据考证日子已到了吃上顿不知下顿在何处的困境。反过来用写文章的智慧去找钱，可能会发大财。谈到为职称，那就既贬低了文学，也贬低了自己。职称这种东西是最近几年兴的说法。只屑往文学史的源流追溯一下，就知道没有几个文人有职称。如果真想评个什么讲师、教授，大可不必伤精费神去绞尽脑汁做文章，只屑学点“厚黑学”，略施小计，讨好上司，大约也能弄个教授做做。何况，在很多僻狭、闭塞、没有文化的地方，“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教授比比皆是。既然如此，又何必为了那点浪得的名誉挑灯夜战，自讨苦吃。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纯属是为了过过“瘾”，满足一下发表文章时的刺激所带来的新

的欲望。就象当官要往高处爬，赚钱一心做亿万富翁一样，经常有两篇铅字出现，人生就有了刺激、有了趣味，也就有了阿Q式的自得意满，如此情趣，何乐而不为？

收在这本书里的39篇长短短短的文字，除了有几篇是我大学时代和目前客居北京大学写的外，大部分是我在云南省昭通师专做助教时完成的，也算是对工作作一个小结。这话当然不对，因为我至今仍然是助教。不过我想说的是，今后的文章可能会改变一下套路。原来是凑足40篇的，有一篇临时让我删了。一是我不喜欢“事实”这两个字；二是那篇文章更属于另一种套路的文字，将来若是有机会，让它在下本书中露面好了。还有几篇研究李瑛先生诗歌的文章也没有收进来，主要是想保证另外一本书的完整性。

在文学研究上，我受六个人的影响比较深，他们是：华人有孔丘、刘勰、王国维；洋人有黑格尔、卡尔·马克思、尼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以上六位大师的观点来帮助我解释文学中的现象，因为他们都是博大精深的伟人。

十分感谢我的朋友、青年诗人朵生春给了大力支持，将拙作收在他主编的丛书里，也十分感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提供了这次绝好的机会，没有他们鼎力相助，这本小书不知何时才面世人间。

工匠的辛酸苦辣尽在不言之中。

是为序

1994年7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自序

【 1】

第一辑

- 论新时期小说的儒文化精神 【 1】
- 封闭与开放：当代民族文学的多种形态 【 19】
- 新时期云南诗歌概论 【 26】
- 新时期云南散文发展概述 【 37】
- 论云南文学的多元化选择 【 44】
- 论云南“后生代”诗的美学追求 【 51】

梦的现实和现实的梦

——《看虹录》解读兼论“京派小说”的现代主义倾向 【59】

地域的困惑 【67】

走向生活 走向文学 【74】

第二辑

两种世家的衰变

——《红楼梦》与《家》的比较分析 【82】

论王蒙小说的构思艺术 【89】

论李乔小说的社会价值 【99】

李乔近作简论 【105】

重构诗歌的美学理想

——《诗美断想》漫评 【119】

论张承志小说的艺术个性 【126】

论张长的小说 【140】

论张长小说的诗美意识 【155】

美的发现与表现

——张昆华中篇小说漫评 【162】

平淡的深刻

——论于坚的诗

【168】

他种下一片生命和爱情之树

——评诗集《隐藏的土地》

【180】

李必雨论

【186】

刘永年报告文学艺术琐谈

【200】

王雨谷小说艺术变化寻踪

【211】

且将浓墨话秀山

——评散文集《秀山的魅力》

【228】

真实的文学和文学的真实

——评中篇小说《寻找包璞丽》

【230】

情感的艺术

——重读《荒火》札记

【236】

评中篇小说《红河水从这里流过》

【242】

略论《傣尼姑娘的雕像》

【246】

诗借语言而存在

——评诗集《陌生的鸟群》

【250】

《民谣》与《还俗》：

普通悲剧和人性的赞歌

【253】

第三辑

读巴金《海上的月出》	【256】
精品大师汪曾祺	【258】
阅读谢冕	【262】
达者王蒙	【260】
骚人张贤亮	【264】
禅师贾平凹	【266】
汤世杰的高原情结	【268】
大题小作	
——江野小小说印象	【270】
写实的人生和人生的写实	
——评江野的两篇小小说	【273】

论新时期小说的儒文化精神

引言：两种特殊环境下的文化重合

新时期文学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各种文学观念沉浮蜕变，作家的自觉意识及生命价值都在各个文学思潮中得到扩张。不过当我认真领悟新时期的小说作品，便发现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都无不契入了儒文化的精神特质。儒文化和作家自我意识的互补照映，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种独特现象——新儒学文学。

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不但要观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个性特征，文风色彩，更要挖掘作品中所传达的人类的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共同感性特征。基于这种认识，当我冷静地对新时期文学反观，便发现内部隐藏着一种强大的儒文化的精神内核。从《班主任》、《伤痕》、《月兰》、《啊》等作品开始，儒文化就左右了作家的创作灵魂。这些带有“伤痕”的小说，极力呼唤人性的解放，把“文革”中的极左路线和封建专制推向理性法庭。以刘心武、卢新华、周克芹、宗璞、张洁为代表的作家，怀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儒家政治热情，率先批判和否定“文革”十年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此后，无论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还是“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其理性核心都是儒文化精神的发展。蒋子龙、柯云路、张锲等张扬改革的作家，在文化心理上接受了儒家“仁

者人也”的文化理想,《乔厂长上任记》、《改革者》、《新星》、《沉重的翅膀》以其深厚的社会学价值,力表匡正被极左路线破坏的社会风尚、道德价值和人与人的正常关系。蒋子龙、柯云路怀着“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新型士大夫精神,直言进谏,改革积弊,倡导清明政治,提倡清官意识,这和儒家“济世济国”的思想是一致的。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则把孔子的“仁爱”演化为具体的艺术精灵,把爱播向人间的每一角落。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把儒家的“礼”提升到理性文化的高度来思索。郑义的《远村》,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都表现了“仁者不忧”、“视富贵如浮云”的儒家独立人格精神。理一理新时期的小说发展线索,不难看出,传统儒学同新时期文学的交潜融汇,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文化现象。

新时期文学的作家群,无法摆脱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困扰,尽管他们用现代化的眼光来观照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但内心深处却长久地浸润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事实上,儒文化所提倡的生存方式,已经被转移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模式,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儒文化精神在新时期文学中反复出现,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民族传统的文化现象。因此,把儒文化同新时期小说比较分析后,我试图将两者放到文化重合的现象上去研究。

从广义上说,新时期作家作品体现出儒学精神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儒文化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史迹,而是一种文化综合现象,它包容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人生准则、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肉之躯。在中国的各个社会变革时期,儒文化总是渗透进当时的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的审美标准,这种文化的反复重合,已经作为历史事实永久地写进中国文学史。儒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支柱,当代作家肩负着延续历史文化的使命,而其作品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儒文化精神而不能另辟新路。新时期文学同儒文化的重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代

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中,不同程度地浸透了儒文化精神的理想,这种浸透有时显得非常固执。即便是当代“先锋”作家如刘心武、王蒙、张承志、张贤亮,在根本意义上,他们小说的最深层意蕴仍然是儒文化的变体。刘心武的“博爱”思想;王蒙的个性自由;张承志的理性精神;张贤亮扭曲的人生体验,都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演变和曲折体现。

儒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完整内容和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实体,从它的开端就注入了中国式的理论血肉——仁爱。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积变,“礼——仁”文化精神,构成了它的权威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真理”的化身。即使是接受了现代化文化的中国作家,也难于逃避儒家构拟出来的“圣圣相传”的“礼——仁”文化系统。新时期小说对儒文化的整体复合,不是抽象的儒家经典著作的诠释,而是一种文化境界的追求和人生理想的评述。新时期文学中的儒文化精神,是指纵贯整个新时期文学史的主题叙述。从这点出发,我把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史看成是儒文化模式在特殊环境下的重合。

一、厚实的文化环境:作家创作人格的源流

一个民族的文化创作过程,虽然不是单方面的结果,但本民族文化的整体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着特殊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认真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几次浪潮,虽然反叛传统文化的呼声一次比一次高,但创造出的作品在内在精神上却没有给我们提供现代思维模式和方法。而原来的传统文化则象紧箍咒一样牢牢地戴在他们头上,支撑着他们的思维信念。在所有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儒文化的思辩性和实用性,更是紧紧缠绕着作家的创作思维,成为新时期作家创作时心灵人格的源流。两千多年的嬗变,儒文化不仅没有丧失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反地,儒文化的基本结构

——“仁”学，总是一再校正和左右中国文化的发展。两千年的历史，对于生活在这个古朴之邦的当代作家，是无法从根本上背叛断裂的。生活在这一厚重文化环境中的新时期作家，他们的人格理想、哲学信念、文学修养直接受制于强大、坚韧的儒文化精神的约束。儒文化的伦理精神、独立人格、文化意识，都成为新时期作家创作时的指导性思维。在许多中年作家身上，儒文化的影响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总想抛弃传统文化的袭因，可是传统文化的影子却紧紧地左右他们的创作灵魂，即使是最先选择“现代意识”的王蒙、冯骥才，其创作思路还是回到传统文化之中。传统的儒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作家无法割舍的文化环境，许多名噪一时的名篇总是闪烁着儒文化的光辉。王蒙《布礼》中的钟亦成的忠诚观念，谌容《人到中年》的操守精神，张贤亮《灵与肉》的宁忠不孝……这些作品中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正是来源于儒家“文、行、忠、信”文化的熏陶。新时期文学对儒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因为孕育一代仁人志士的儒文化有着强劲的生命力，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血雨腥风，内忧外患，而中国古代文化却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和孔子的“仁”学结构有着重要关系。特别是历代王朝把儒学尊为“圣学”，这就酿成了人们在政治决策、个体人格乃至经济生活都必须以儒学为依据。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定势，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被沉积下来，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强大的文化环境。从新时期小说的总体文化倾向上看，环境文化的潜在影响已经渗透进作家的创作人格中。很多有影响的小说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都可以从儒家文化精神中找到它的原胚。

黑格尔认为：“在艺术作品中各民族留下了他们最丰富的见解和思想；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把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①儒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的

①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册第38页

确是打开中国人灵魂的一把钥匙。由于文化背景的缘故，儒文化对新时期作家的影响，已经部分或全部地溶入作家的文学经验之中。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儒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改造和演化，其文艺方法论和文艺审美论，在每一时代都被纳入中国文化的正宗。新时期的作家对儒文化，已经不是停留在知识上的表现层次，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体验。《古船》、《鲁班的子孙》写的是新经济意识的觉醒，作品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仍然是孔子提倡的“君子之道”。

儒文化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其影响不断通过历史媒介的传播流传下来，不仅在知识界，就是在普通民众的心中，“仁者爱人”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两千多年来，儒文化几乎深深积淀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作为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儒家哲学，铸就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性格，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不难理解儒文化和新时期小说的互补重合。在作家的创作人格的构成要素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是影响作家审美心理的主要因素。《黑骏马》中男主人公重返草原寻找蒙古族老奶奶的宽厚仁爱，《小鲍庄》中涝渣对寡居老人的仁慈照顾，《棋王》中王一生面对逝去的时代，以智者的仁爱充实内心情感，《如歌的行板》中的周克对自己选择祖国的真诚信念，《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报效祖国和对叛逃者的不可饶恕。这一切都说明，文化环境的熏陶，使新时期的作家无法从创作人格上割裂对传统文化的信念。

儒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从一元到多元的辩证统一过程，是中国文人的集体智慧和理想结晶。一方面，各个时代的统治者从他们政治完善的目的出发，对儒家关于人的统治哲学进行取舍弥补（如从“君君臣臣”演变为“精忠报国”）；另一方面，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根据他们对儒学的感悟，对儒文化精神进行了重新创造。两种结果都使儒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的正宗。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儒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抵牾（如佛学的

传入),但经历了互相交往、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过程后,中国人仍然选择了儒文化,甚至把外来文化同化到儒学之中。象近代学者康有为、胡适、梁实秋等人,都是最先倡导西学并为之献身的,但到最后都相继委身于“孔孟之道”。这种中国文化人的双重性格在新时期作家中也大有人在,他们一方面呼吁小说革新,但他们作品中的总体文化精神却是儒文化精神的体现。创作人格仍然远离外来文化。王蒙、冯骥才、李国文都倡导过小说的现代技巧,但是就其作品而言,内在的哲学人生观还是传统的中国儒文化的体现。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所宣扬的坚贞挚爱、“和谐”、“温厚”的仁爱哲学,无论人世沧桑、风风雨雨,高女人对他的矮丈夫都是坚贞不一。冯骥才理想中的爱情价值尺度,不可能脱离儒文化中“仁爱”、“亲人”的思想内核。在王蒙的小说中“任重而道远”已经成为一种整体的审美意识。《布礼》中的钟亦成为报效人民虽九死而不悔;《蝴蝶》中的张思远,无论是囚犯、还是部长,都视自己为大地之子。至于《春之声》、《海之梦》、《相见时难》中的知识分子群象,在人的价值取舍上,都是儒文化的体现。从文学的源流上说,儒文化已经深深地潜入了作家的心灵,使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由于主观的心理祈求和客观文化环境的影响,很自然地把“儒学”作为他们的创作品格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新时期的小说,仍然大多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亲善、依赖关系,这种强韧的亲善关系体现了东方民族的情感特色:即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融合。儒家的道德观是维系中国人彼此关系,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一种独特文化模式,中国作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都源于这个文化模式,因此在创作上,新时期的作家不可能脱离儒家“仁”“礼”思想的文化大背景。“仁”、“礼”哲学长时期的延伸,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新时期大量写博爱、平等、亲善、和谐为主题的小说,都是这一文化模式的集中体现。即便是写改革的小说,也仍然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的

儒家社会思想的再现。儒文化已经深入作家的创作意识，成为无法避开的心理人格的哲学源泉。从另一个角度讲，新时期文学和儒文化精神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的，其社会根源是厚实的文化背景提供了作家在心灵上反思历史和回味人生的内在契机。儒文化是在春秋战国的开放性哲学氛围中涵育而成的，它两千多年盛传不衰的根源在于孕育它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都是开放性的。因此，当新时期的作家们在一个更为开放、更为现代的时代讨论人生、回顾历史文化时，原始儒学中关于人的哲学命题，文艺审美的合理化精神，与作家的心理性格一拍即合。文化探索的结果，作家们更加无法割舍“圣圣相传”的“仁”学结构。

二、人格主题：“仁”、“礼”的化身

儒文化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特殊文化人格——“礼”。而新时期的优秀作家的小说叙述结构，则体现了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嬗递。王蒙、林斤澜、张洁、冯骥才对中原文化渊源极深的“礼”学人格存在一种共同的默认感。他们都写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义的寻求，体现的是“仁”的意志进取，“礼”的博爱精神。在他们的笔下，“人格”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延续儒文化的创作模式。

王蒙写知识分子的小说，追求的是个体人格的完善，强调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意志的克制和锻炼。他笔下的人物如岳之峰、翁式合、曹千里，都主动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同现实的不合理性联系在一起，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得失、不问安危荣辱，即便是身处逆境中的张思远、岳之峰，仍然保持着“不怨天尤人”的道德理想，以及“志士仁人”的献身精神。曹千里的刻苦自我修养和内心深处的历史使命感，虽然带有对社会的检视与批判，但其内心情绪的自我控制和儒文化的“刚毅木讷而近仁”的养身之道